

修订本

伪满洲国史新编

解学诗／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我国东北地区冒出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产物。而九一八事变，又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满蒙」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后来的历史又证明：侵占「满蒙」是日本征服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人民教育出版社

修订本

伪满洲国史新编

解学诗／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我国东北地区冒出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产物。而九一八事变，
又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满蒙」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
后来的历史又证明：侵占「满蒙」是日本征服全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宏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满洲国史新编/解学诗 著. —修订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

ISBN 978-7-01-013414-7

I. ①伪… II. ①解… III. ①满洲国(1932)—史料 IV. ①K265.6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4669 号

伪满洲国史新编

WEIMANZHOU GUOSHI XINBIAN

(修订本)

解学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4 月第 3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642 千字 印张:38

ISBN 978-7-01-013414-7 定价:8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凡 例

一、各章本文的注释,原则上均在页下注中表述,文字少的注释和补充说明或勘误,用[]直接写在相应的文字之后。

二、从中外书刊引用的语言和资料,按著者、书刊名、出版单位、时间、页码等注明其出处。多次引用者,仅注明书名和页码。外文书刊名译成汉语,日文书刊名全为汉字者不再翻译。少数书刊,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四次十年史》,简化为《满铁第四次十年史》。

三、本书利用档案文书较多,各种档案文书分类编号不同,故注明出处时难以划一。同类档案文书,特别是同件档案文书,注明时力求前后一致。

四、本书引用日伪机构的资料较多,其作者、资料名称、刊出时间等,多不规范、不完整,只能据实酌情注明出处,同一资料,力求统一。

五、各章的统计表、机构表、一览表等,均置于正文相应文字之中,因数量不多,故不编排序号。

六、正文中年代、数值均采用阿拉伯数字,但中文引文一仍其旧,年号,本文和注释均使用公元。

目 录

凡 例 1

- 绪 章 本书基本思路与视点 (1)
- 帝国主义军事殖民统治典型 (1)
- 从具体变迁中看其迅速衰亡的历史必然 (5)
- 历史现象质的规定性不应混淆 (8)

第一编 发动事变 制造伪国(1931.9~1933.5)

第一章 日本大陆“建国”政策 (13)

- 侵华决定步骤 (13)
- 刺进东北三把刀 (16)
- “满蒙独立”阴谋 (18)
- 皇姑屯事件 (22)
- 武力发动准备 (27)
- 万宝山案与中村事件 (31)

第二章 九一八事变 (35)

- 事变前夕 (35)
- 爆破铁路 会攻奉天 (37)
- 长春激战 吉林刀不血刃 (41)
- 江桥激战 齐齐哈尔沦陷 (45)
- 西犯锦州 北占哈尔滨 (50)

第三章 伪满洲国面世 (56)

- 关东军执意建立“满蒙国” (56)
- 策动三省汉奸“独立” (60)

溥仪潜离天津 (66)

刺刀导演“建国”丑剧 (71)

溥仪与本庄繁秘密换文 (76)

第四章 日本“承认”伪满前后 (78)

军铁一体所为 (78)

蒋、张不抵抗政策 (83)

“一·二八”上海事变 (87)

国联调查团及其报告书 (91)

“焦土外交”与承认伪满 (95)

第五章 全面攫取经济命脉 (100)

独霸铁路交通 (100)

攫夺邮政设立电电会社 (104)

吞并“四行号”设立伪央行 (107)

强占海关及盐税机构 (113)

实行集权财政 (115)

第六章 抗日军兴 热河失守 (120)

吉林自卫军 (120)

马占山重新抗日 (125)

辽宁民众自卫军 (130)

辽西抗日义勇军 (134)

山海关事件与热河沦陷 (137)

第二编 血腥杀伐 殖民统治(1933.6~1937.6)

第七章 傀儡政权体制 (145)

关东军司令官“至高无上” (145)

顶级傀儡溥仪 (151)

日本人官吏网 (157)

省县旗伪政权 (163)

第八章 军警统治 (167)

军警的中枢 (167)

- 帮凶——伪满军 (170)
- 警察特务 (176)
- 保甲制度 (179)
- “治本”毒策“集团部落” (182)
- 诱降“策反”谋略 (186)

第九章 凶狂杀伐抗日军 (192)

- 义勇军余部坚持抗日 (192)
- 红色抗日游击斗争 (195)
- 关东军全线出击 (200)
- 东北抗日联军 (206)
- “治安肃正三年计划” (210)
- 白色恐怖愈演愈烈 (214)

第十章 经济附庸化 (220)

- 经济统制政策 (220)
- 特殊会社 (224)
- 畸形产业 (228)
- 民族工商业凋落 (233)
- 农业危机与日本移民 (237)
- 殖民主义财政 (243)
- 经济从属性日深 (245)

第十一章 协和会与文化专制 (251)

- 所谓“精神母体” (251)
- 民族离间与民族分治 (255)
- 摧残教育 (259)
- 言论文化统治 (264)
- 文艺界奋斗牺牲 (268)

第十二章 关东军与华北事变 (272)

- 关东军入侵华北 (272)
- “华北自治”阴谋 (277)
- 华北走私与兴中公司 (282)
- 关东军制造伪蒙古国 (288)

第三编 经济统制 政治高压(1937. 7~1941. 12)

第十三章 “日满一体化”的行政改组 (295)

- 推行战时行政 (295)
- 治外法权的“废除” (300)
- 各级伪政权战时体制化 (304)
- 日本人次长制与次长会议 (310)
- 军警合流与“盖世太保” (314)

第十四章 “大讨伐”·大逮捕 (322)

- 三江“特别大讨伐” (322)
- “四一五”与“三一五”大逮捕 (328)
- 抗联西进 日伪“讨伐” (331)
- 讷河事件与三肇惨案 (336)
- 野副“大讨伐” (339)
- 从大连放火团到“一二·三〇”事件 (344)

第十五章 “产业五年计划” (350)

- 计划指标不断加码 (350)
- 执行日本物动计划 (354)
- 全面经济统制 (358)
- 满业庞大计划破灭 (362)
- 战争资源的重点掠夺 (368)
- 铁路交通与“北边振兴计划” (375)

第十六章 农业与日本大移民 (379)

- 农业计划与政策 (379)
- “兴农合作社” (383)
- 农民头上的两座大山 (385)
- 日本百万户移民计划 (389)
- 日本开拓团是侵略据点 (393)
- 中国农民沦为日本移民的佃户 (396)
- 对朝鲜族移民的统制政策 (400)

第十七章 民族奴化	(403)
所谓“国民组织化”	(403)
“日满一如”与民族同化	(406)
改祖换宗的“惟神之道”	(410)
国本奠定诏书	(413)
“新学制”——奴化教育	(414)
建国大学与大同学院	(418)
大弘报处与文化统治	(421)
“满映”与“国策文艺”	(424)

第十八章 侵华犯苏的基地	(428)
东条兵团进犯察绥	(428)
满铁夺取华北路矿	(433)
伪满、伪蒙与汪伪	(439)
张鼓峰事件	(444)
关东军在诺门坎一败涂地	(446)
“关特演”及其前后	(449)

第四编 紧急掠夺 骤然衰亡(1942.1~1945.8)

第十九章 战时法西斯高压	(455)
伪政权进入临战状态	(455)
特别治安法庭和矫正辅导院	(459)
北满大血案	(465)
“桃园工作”与“晓工作”	(469)
血染文教界和宗教界	(472)

第二十章 紧急经济掠夺	(477)
《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	(477)
“国防经济体制”	(479)
“大陆物资交流”的强化	(482)
第二个“产业五年计划”	(485)
掠夺钢铁的应急对策	(487)
“人肉开采”煤炭与石油梦	(491)

有色金属的搜掠 (496)

第二十一章 东北人民两大劫难 (499)

粮食掠夺居首 (499)

“紧急农地造成” (502)

粮谷“出荷”——横征暴敛 (506)

剥夺口粮的粮食配给 (511)

“国民皆劳”——全民劳工化 (514)

强制劳动手段种种 (516)

刺刀下的战争奴隶 (521)

第二十二章 “决战经济”之绝 (526)

生产全线崩溃 (526)

无限搜刮民财 (531)

恶性通货膨胀 (537)

工商业彻底破产 (541)

多人沦为“经济犯” (545)

第二十三章 四面楚歌 (548)

八路军挺进热辽 (548)

伪满自西南一角崩塌 (551)

抗联小分队驰骋北满 (558)

反统治反掠夺反奴役斗争跌宕起伏 (563)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567)

第二十四章 土崩瓦解 (572)

关东军——“稻草人”兵团 (572)

罪恶的细菌战 (578)

困兽犹斗 (583)

苏联红军进军东北 (587)

溥仪退位被俘 (591)

后 记 (595)

绪章 本书基本思路与视点

帝国主义军事殖民统治典型

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中国东北地区是日军占领时间最长、日伪统治机构最完备、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最为残酷的地方。在这里,日本侵略者既未满足于建立一个名义上属于中国主权的亲日政权,也没有设置总督府实行直接的军政统治,而是利用废帝溥仪,打造了一个伪满洲国。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占领区所采取的此种统治模式,有别于中国其他沦陷区,同时在世界帝国主义殖民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以“国家”面貌出现,实行实质的军事殖民统治、掠夺的典型。

日本帝国主义并非不欲对中国人民进行直接全面的统治,尤非不想把中国东北立即纳入日本版图。彻底侵吞东北地区以至全中国,乃是日本大陆侵略政策的根本目的所在。比如,早在 1929 年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就曾提出,武装占领东北,实行以大将或中将为总督的军政统治;及至 1931 年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更公然主张把“满蒙变为日本领土”。只是由于顾忌到“目前如急于付诸实施,有可能遭到国际间的物议”,而暂且作罢。

应该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当权者快速做出决定,制造一个“由中国本部分离独立的”伪满洲国,并非像日本某些出版物(如:《溥仪,清朝最后的皇帝》)所说的,单是“关东军无视本国不扩大的方针,满洲事变发生半年后制造了满洲国。”制造伪满洲国,是日本统治集团的全体意志。具体而言,是 1932 年初日本中央军部与外务省商定,经内阁会议通过的。它表明,在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实施占领区殖民统治问题上,日本统治阶层与集团,完全达成了统一。关东军只不过是政策执行者。日本统治集团心里明白,先打造起一个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有利于有步骤地最终吞并中国。人们都已经看到,在伪满洲国出笼仅仅两年之后,日伪势力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稍稍站稳

了脚跟,就迫不及待地在伪满洲国实施了与日本国体一致的所谓“君主制”。苦苦追做皇帝梦的溥仪终又登上“大宝”。日本侵略者只要牢牢地控制和操纵了伪满洲国,又能对偌大的中国继续侵略渗透,它就不会真像九一八事变当初那样,惟恐复辟运动引起燎原大火而不可收拾;相反说不定,有朝一日恰可利用伪满洲国这个傀儡王朝,更加扩大地进行对华侵略。伪满洲国存在的14年间,日本侵略者逐步升级地抛出“日满不可分”“日满一体化”和“日满一如”等等,都不是空泛的政治口号,而是在利用伪满洲国加紧和强化对东北沦陷区统治、掠夺的同时,处心积虑采取的彻底从版图上吞并“满蒙”步骤。如所周知,1940年日本策划进行的伪皇溥仪第二次访日时,竟令溥仪将日本天照大神和三种神器捧回来,当作伪满的“开国元神”供奉祭祀,并与日本一道实行“神道”治国,其司马昭之心,难道不是路人皆知?

不过,到伪满洲国土崩瓦解为止,“满蒙”毕竟尚未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吞并;从伪满洲国到正式被划入日本版图至少还有半步之遥,两种情形尚且不能等同。不过差别只是形式,实质上,伪满洲国与日本直接军事统治,并无二致。中国人民之所以特在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满洲国”上加个“伪”字,并非是认为它不是客观存在。以溥仪为“皇帝”的所谓“满洲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各类统治机构一应俱全,其所发挥的政权职能也不亚于中外历史上任何暴力机构;问题只在于,当时东北领土主权全部旁落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日本的枪杆子操持着伪满洲国的统治、掠夺的实权,伪满政权是日本统治的延长。所以,伪满洲国不仅是不被中国承认、甚至也不被世界承认的非法国家。在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伪满洲国的出现是一股逆流;在中国历代政权更迭史中,伪满洲国的面世,是侵略者投毒而孽生出来的怪胎。

本书第三章揭露了溥仪隐瞒的一桩重大罪行,他因畏罪,就连从苏联被送到日本东京国际法庭作证时都未敢交待,故被称为伪满洲国“最高的隐秘”。这就是:伪满洲国出笼时,溥仪在日本人胁迫下曾出具卖身契,即出卖领土主权的卖国契约,而形式却是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即一般所称之日伪“密约”。其基本内容有三:一是日本驻兵东北,担任所谓“国防及治安维持”;二是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等交给日本或日本“指定之机关”;三是伪参议府的参议和“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都要任用日本人。“密约”于1932年3月12日经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后,算作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的翌日即1932年3月10日签署的,实际上早在溥仪由旅顺出发去长春赴任途中,3月6日在汤岗子就被迫于关东军司令官代理板垣大佐出示的文本上签了字。当同年9月15日日本演出“承认”伪满洲国一幕而签署所谓《日满

议定书》时，“密约”成为“议定书”的保密附件。日本和溥仪一样，始终不敢将“密约”解密，因为它是日本利用傀儡夺取中国领土主权的主要罪证。

“密约”签署的翌日，诸如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等一切重要岗位上都坐上了日本人，还有 230 名日本人官吏被派进伪满各部门，控制起各该方面的实权。此后经过一年多，更加规范的控制与操纵伪满洲国政府的运作体制终于出台，这就是 1933 年 8 月 8 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亦即所谓“八八”决议。它规定了日本对满政策基调，也是控制与操纵伪满洲国总纲领。“要纲”将伪满洲国定位为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与大日本帝国有着不可分关系的独立国家”：伪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家”，却又必须“不可分”地依附、从属于“日本帝国”。至于日本对从属于它的伪满洲国的控制、操纵体制，即对伪满洲国的所谓“指导”，则明确规定为：“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本官吏实际实行。”这个政治统治体制，经 1937 年行政改革、所谓治外法权废除和临战体制化等等而不断调整强化，并贯彻始终。其特征是：

（一）关东军司令官的统治权至高无上。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即实行“二位一体”制，是因为伪满洲国毕竟还保留所谓“独立国家”的外貌；而关东军司令官对伪满洲国进行的被称作“内部指导”的幕后操纵，是“利用威力”进行的，所以实质是武装占领与殖民统治的合一；而且，由于关东军司令官兼着“大使”的头衔，恰好更便于他“公开表态和内部指导的协调一致”，亦即可以对伪满洲国进行公然的干预。关东军设有专门处理对伪满“内部指导”事务的第四课；在溥仪身边派了一名导演溥仪一切举止行动的常驻代表。所以，溥仪皇帝是名副其实的头号傀儡；而关东军司令官是货真价实的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二）实行“总务厅中心主义”。按伪国务院“官制”，在诸大臣中，国务总理大臣是唯一向伪皇帝负责的“国务大臣”。权力如此集中于伪国务总理大臣，实质是为了集中到日本人总务长官身上。“八八”决议明确规定：“为使日本人官吏成为活动中心，为便于统制起见，决定保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体制。”这种“总务厅中心主义”后来竟进而成为公开的“彻底的总务厅中心主义”。于是伪国务院下属的总务厅反过来统辖着整个国务院；伪国务总理大臣的下级幕僚总务厅长官却实际指挥着总理大臣。

（三）日本人“火曜会议”成了伪满最高决策机关。本来各部的日本人总务司长也都总揽各部大权，后来竟又都升格为各部次长，实行日本人次长制，他们不但掌控各部，而且组成“火曜会议”操持伪满最高决策，使伪国务院会

议变得有名无实。一切重要国务与决策,均须先由“火曜会议”审议决定,以贯彻关东军意图和取得关东军司令官预先批准,然后再交由伪国务院会议做形式上的通过。及至伪满后期,只由“火曜会议”审议,不交伪国务院会议而直接付诸实施的法案,亦不鲜见。

(四)日本人官吏网把持全国各级政权,为此实际执行着不见成文的比例制和定位制。比例制即日本人官吏所占比例,此种比例当然因机构性质而异,但总的趋势是日本人所占比例与日俱增。治外法权废除后,由于日本与伪满统治合一,伪满政权中日本人官吏猛然增加,警察、司法等暴力机关,与伪国务院总务厅一样,几乎实现了全部日本人化。所谓定位制,即要害岗位都必须配置日本人官吏的制度。省、县、旗等地方政权机构,掌控实权的副省长、副县长、旗参事官,以及其他重要岗位全由日本人充任。伪满后期,边境的若干省长、县长也改为直接由日本人担当。总之,在伪满洲国政权中,掌控实权的日本人官吏自成体系,并与日本链接,特别是高层,许多都来自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惯于通过社会团体或与社会团体联合推行政策和政务,这个“特色”也延用于伪满洲国,这就是伪满洲国政权与所谓协和会组织互为表里,相辅而行对中国人民进行统治。原来,军部中的一派人主张,为把新打造的伪满洲国纳入准备与美苏大战的总力战体制,须与既有“土著”社会达成妥协,于是掀起“民族协和”运动,筹建协和党。但它有悖于关东军的占领区一元化专制统治的政治主张,故将协和党变成了协和会。而协和会被定位为“唯一的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组织”,它“既非政府之从属机关,又非对立机关,乃政府的精神母体。”实际上,它是日本帝国主义附庸的伪满洲国的宣传机器,以“王道”之名推行殖民统治霸术的工具。协和会组织和伪满政权一样,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设立,并与伪满政府实行二位一体,也同样实行次长制,掌握实权的协和会副本部长由各该日本人省次长、副县市长、旗参事官担任。1943年二位一体过渡到三位一体:日本人副县长旗参事官、协和会副本部长和全面统治农村经济的县旗农业合作社副社长集于一身。其目的无非是强化“国民组织化”,控制群众,和便于战时物资与劳动力的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欺世盗名,剥开他们精心打造的伪满洲国画皮,展露出来的是赤裸裸的军事占领、军事统治和军事掠夺。这不但是无法掩饰的不争的客观事实,而且也是侵略者们的公然自我招供。关东军参谋和关东防卫军高级参谋片仓衷在奉天的一次讲话中就曾公然宣称:伪满洲国是根据日本军方要求而建立的“军政国”。既然如此,我们对沦陷时期东北地方历史的研究,就不能不把伪满洲国这个日本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的典型作为课题对象进行认真

的剖析。而在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史的研究中,伪满洲国这个典型的研究,也应该有其位置。

从具体变迁中看其迅速衰亡的历史必然

作为伪满洲国全史,必须综合诠释伪满时期的基本史实,也就是进行全方位研究。为了判明伪满洲国在日本进行侵略与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和伪满洲国史的本质特征,应将各个重要史实置于各该当时历史大环境中去考察。既要逐一分析认清基本历史史实,又必须展示附随于历史大环境发展演化的它本身的历史阶段性。为了做到纵横兼顾,每桩史实,不可能在其跨越的各个时期全部提及,而只能在最可本质地显现其意义的阶段内集中阐述,以期重点突出,脉络清晰,展示历史因果关系,和历史演化的规律性。本书将伪满洲国的特殊时空,划成四段进行剖析,就是力图活生生地揭示其兴亡的短命历史必然性。

第一编,除了第一章追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历史,揭露其大陆侵略政策,说明其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远因外,其余五章内容均围绕编名所示主题:“发动事变,制造伪国”。时限为1931年9月到1933年5月,即九一八事变前后,到日军进攻热河越过长城并与中国签订《塘沽协定》。显而易见,揭露日本侵略者拾起中国废帝溥仪,网罗汉奸,拼凑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罪行,是全编的要害。不过,伪满洲国的出笼,绝非是溥仪及一群汉奸在日本人指使下走马上任的简单问题。此幕历史丑剧是由火与血所构成;攻城略地,血腥杀伐,罗网汉奸,攫取主权,才应是该阶段的本质主题词。因此,关东军阴谋制造柳条湖事件,突袭沈阳,占领东三省,围剿多达30万之众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进攻热河等武力侵华行径,不能不是本编多费笔墨的重要内容。日本帝国主义正是以对华大规模行使武力为背景,迅速统一侵华政策,抉择殖民统治模式制造伪国,迫使溥仪签署卖国“密约”,夺取经济命脉;也正是坚持武力侵华立场不放,独占“满蒙”,与国际社会分道扬镳,采取孤立主义,甚至为承认伪满洲国而宣布实行所谓“焦土政策”。至于1933年5月之所以构成为该阶段的终结,是因为关东军越过长城进犯华北意味着包括热河地区在内,武装占领全东北业已完成,同时由于《塘沽协定》签订,冀东22个县沦为所谓“非武装区”和日本扩大侵华的基地,而使伪满洲国有了屏障。

以“治安第一主义”为施政总方针的第二阶段,时间为1933年6月到

1937年7月。显然,实行变本加厉的血腥杀伐,和确立军事殖民统治,是该阶段日伪行动的重中之重。前者,以1933年6月关东军从华北撤回实行“分散配置”,对抗日军民采取全线出击态势为开端,又经集中配置,季节讨伐,到1936至1937年将讨伐镇压推到高峰;后者,1933年“八八”决议的实行至关重要,此后不但“二位一体”的关东军司令官的伪满太上皇地位更加明确,总务厅为中心的日本人操纵伪满洲国的官吏网全面建立,而且伪满政权终于实行帝制,并强化了县旗伪政权,特别是建立起受命于关东军和关东宪兵队的伪军伪警暴力机关与体系。结果是日本侵略者的杀伐镇压与中国人民的抗敌斗争,因果循环地不断升级。中国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虽然已转入低潮,“红色抗日游击战争”却代之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迅速壮大为拥有11个军的抗日联军,它把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推向新的高潮。而敌人则抛出所谓“治安肃正”计划,妄图用三年时间消灭东北人民抗日力量,把屠杀镇压东北人民的血腥行径推向极致。残忍的东边道大讨伐,和“四一五”白色恐怖大逮捕,都是反映该阶段历史本质特征的大事。与此相适应,经济统制政策开始实行,控制军工和重要产业的特殊会社体制普遍建立。文化专制也已开始。此外,伪满洲国作为日本扩大侵华基地的作用充分显现,将华北闹得乌烟瘴气的“华北自治”阴谋,就是关东军伙同华北军所为,满铁也没有袖手旁观。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进行,伪满洲国施政重点也从政治上的杀伐镇压,转向与日本一道实行战时体制,即建立战时经济,实施战时高压政治。因此,构成为伪满洲国变迁第三阶段的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推行所谓“三大国策”成为压倒一切的大事,这就是:战时性的“产业五年计划”、日本百万户移民计划和对苏备战的“北边振兴计划”的推行。其间,煤、铁等战争资源的掠夺犹成为大事中的大事。但是,由于掠夺计划过于庞大,脱离实际,造成人、财、物严重匮乏的结构性矛盾,战争经济被推上了日趋恶化的不归路。与战争经济相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除了上层强化日本人的总务厅中心主义,下层扩大地方行政机关外,主要体现是:伪满政府“产业”、“经济”、“交通”三部的建立,警、军合一及警军与行政协调,和建立保安局特务网。在这种形势下,三江“特别大讨伐”、“三一五”大逮捕、讷河事件、三肇惨案、东南“大讨伐”、大连放火团事件、“一二·三〇”事件等,构成了一幅幅东方法西斯暴行图。此外,溥仪从日本捧回“天照大神”,实行“惟神之道”,和作为民族奴化之举的所谓“新学制”及“国策文艺”,也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尽管关东军不断抽调兵力参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苏联却始终不失为其头号战略假想敌。但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侵害了美英在华利益,1940年美

国对日禁运后更加剧了矛盾。于是日本对外侵略的“北进”、“南进”之争后者主张得势，德苏战争开始后，日本又乘人之危妄图一举解决北方——苏联问题，由于苏军并未像预想的那样大量西调，才又决定先给美国一击，实行“南进”政策，偷袭了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伪满洲国进入第四阶段，即最后阶段，从此到 1945 年日本宣布投降，战时紧急经济掠夺愈演愈烈，从此走上了政治经济的迅速衰溃的绝路。1941 年 12 月 22 日由伪满洲国政府出面公布之《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的核心是，战时急需物资的“增产和对日供应”。而所谓战时急需物资明确规定为：铁、煤、液体燃料、农产品等，此后不久非但农产品被置于首位，而且劳动力资源和财政金融掠夺也推进到极致。实行以战时急需物资掠夺为中心的战时紧急经济，政策上强调的是，经济结构的“国防经济体制”，和强化“大陆物资交流”。前者实际就是调整和扩大经济统制，即放弃“一业一社”原则，改组特殊会社，图谋统制企业“经营的合理化”，同时以《产业统制法》和《事业统制组合法》的实施为标志，在生产和流通等一切领域实行统制，将经济生活全都纳入战争轨道。后者则是在日本遭受国际禁运封锁的形势下，妄图将伪满洲国作为日、朝、华等大陆紧急战时掠夺的中心，发挥经济兵站基地的作用。至于所谓战时急需物资生产的“应急策”，归根结底，就是拼现有设备，榨人民血汗，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杀鸡取卵，盗取资源。很明显，支撑此种经济运行的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力和劳动力再生产所最不可缺少的粮食。因此，伪满洲国末期日伪疯狂推行劳动力和粮食强征政策，使东北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蒙受巨大灾难。尤其是自 1943 年起，在日本败局已定，海运全面受阻，美机频繁轰炸，战争逼近本土的严峻情势下，伪满洲国随之宣布进入“决战经济”阶段，战争经济走进死路：生产全线下降，物资严重缺乏，通货膨胀无可遏止，经济统制全部失灵，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行将就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东北人民反侵略、反掠夺、反奴役斗争掀起高潮。特别是 1945 年的通河暴动和桦甸八道河子、横道河子起义的发生，更具有象征意义，而阜新煤矿和军事工程中特殊工人毅然举行暴动，则表明冲破黎明前黑暗的战斗业已打响。实际上侵略者已陷入四面楚歌。从苏联野营分批回归东北的抗联小分队，协同留在东北的部队，多处侦察和袭扰敌人；西南方面更有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的部队，突破长城，进击敌人，收复失地。日军已是强弩之末，昔日自诩“无敌”的关东军变成了老弱编成的“稻草人”兵团，在强大的苏军面前，一触即溃。而被关东军挟持到通化山沟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也在日本投降的同时宣布垮台。